

红色故事

长征中国国家银行
在遵义的成功运作实践

李性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史称“遵义会议”。鲜为人知的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在遵义开展了一场较为隐蔽且意义深远的“金融战”。这场“金融战”成为我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早期成功实践,也充分展现了我党深遂的金融思想和丰富的金融智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称国家银行)成立。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与财政部一起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率领全大队人员以及约200名运输队员,挑着国家银行(中央金库)尚存的银圆、国币、金子和一些首饰、珍宝,以及印制国币的机器、材料等共一百余担,被誉为“肩挑的银行”,在一个警卫连的保护下,从瑞金出发踏上漫漫征途。沿途不仅要确保安全,还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军筹款筹粮必要物资,任务艰巨而繁忙。

1935年1月,肩挑着国家银行重担的第十五大队,随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由于长征途中,红军的财政经费已所剩无几,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为使部队给养尽快得到补充和休整,第十五大队和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立即通过没收、征收土豪劣绅和奸商的非法财产等方式,充实银行基金、解决军费来源等问题,并在城内开展了一系列商业活动,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在遵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负面宣传影响,当时的遵义城内,大多数商家关门停业。为使急需补充给养的行军能买到所需物品,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登门拜访遵义知名人士刘伯庄,向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请他出面动员各商号开门营业,确保红军能以所携带的国家银行临时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即群众所称的“红军票”)按市价支付所购物品。

在刘伯庄等人的动员、帮助下,商店纷纷开门营业,红军买到了生活必需品,一些商店老板还积极筹集布料供红军赶制服装。解决了红军所需物资的购买问题后,毛泽民又带领大家投入到组织没收官僚军阀财产、分发给穷苦人民的工作中。

遵义当时经济、商业比较发达。红军抵达遵义后,随即截获并没收了当时黔省主席王家烈经营之价值几十万元的盐行和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定购的价值5万元的香烟。除留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在市场上出售。

当时,烟、酒、茶、盐、棉布等商品均实行专卖,尤其是食盐被以昂贵的价格出售,致使许多百姓买不起盐。对此,毛泽民提出将“红军票”与售卖香烟和食盐挂钩,实行优惠政策以促进货币兑换。

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带出来的,有五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面额。票正面上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面值下方左右有毛泽民和邓子恢签名,下端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贰角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伍分纸币。

“凭票X张兑换银圆壹圆”,票面四角花符圆圈内有面值文字。

当时,国家银行在遵义各处设立兑换点,堆放银圆、食盐和香烟等实物,让群众按优惠价兑换国家银行发行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按照毛泽民的思路,一面将红军票与稀缺商品挂钩,既促进流通,又迅速建立信誉;一面将没收的大量食盐之一部分廉价公开出售,一部分发给穷人,为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另外,红军在遵义期间,之所以商店都照常营业,皆因“红军票”一律按日兑现。还由于价格公道,群众兑付“红军票”的积极性迅速提升。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唯一正式发行苏维埃纸币的地方。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时,依旧沿袭长征开始前,各根据地以银圆为本位币的既有制度,将红军票与银圆挂钩,按照1元“红军票”兑换1.2银圆或7斤食盐的比价,形成一定程度的银圆本位币制,从而建立起群众普遍接受的信用方式。

据时任国家银行业务处处长曹菊如回忆:“遵义是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银行工作人员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10天里主要是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与回笼货币的活动。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既可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

关于在遵义期间使用“红军票”一事,据时任国家银行工作人员钱希均在《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中记载:“本来,从江西出来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起了变化,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家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面值与光洋相等。为提高苏区纸币信誉,我们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

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严明组织纪律,坚持公平买卖,凡取用群众的粮食、物品都务必留下银圆或借条。红色政权和红军队伍信用的增强,有力提升了红色货币的流通信用。

据钱希均《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中记述道:“我们要撤走了,但还有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里未收回,林(伯渠)老和泽民商量,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到影响。于是组织了几个临时兑换处,用光洋、食盐兑回我们的纸币。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天,估计红军纸币基本上全收回了才撤离遵义。”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苏维埃纸币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因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当年少数来不及兑换的“红军票”,也于1950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以0.15元人民币兑换1元“红军票”的兑换率收回。如今还能保存下来的“红军票”,已是凤毛麟角,成为见证伟大长征的珍贵革命文物。

国家银行在遵义的12天内,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以惊人的效率和高超的智慧,顺利完成货币的发行、流通、回笼等艰巨任务后撤离遵义。在土城青杠坡战斗后,为摆脱敌军追击,轻装一渡赤水河,又毅然将携带的铜币全部扔掉,烧毁部分纸币,将银圆分散给红军战士背着走。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过程中,烧毁大部分纸币,将所有的印刷和造币机器全部沉入赤水河。

1935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抵达瓦窑堡后,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6年底,国家银行随红军主力转移至陕甘宁根据地,开启了新一轮红色金融建设。

长征期间,银行工作人员肩挑着整个部队的资财,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克服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重要任务;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谱写了我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光辉篇章。

遵义故事

说起贵州明清两代诗歌,许多人都知道《黔诗纪略》,若进一步追问,关于《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后编》,大多数人就茫然不知了。实际上,《桐梓诗略》《播雅》与《黔诗纪略》算得上是郑珍、莫友芝等人编纂《遵义府志》的“副产品”,《黔诗纪略后编》与《黔诗纪略》则是“姊妹篇”,这四部诗歌总集背后讲述的则是两代贵州人的文化守护与传承。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遵义知府平翰聘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纂修志书,需要搜集大量一地资料,而“艺文”(记述、歌咏一地的诗文)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编修《遵义府志》中,郑珍、莫友芝等人收集了大量遵义乃至贵州前人的“艺文”资料。此次修志,赵旭(字晓峰,桐梓县人)以生员身份担任采访,专门搜集桐梓县资料。这一年,赵旭18岁,精力旺盛,好搜集古籍与游历,不畏辛苦,网罗搜集的资料“视他县为多,而晓峰意未歇也”(郑珍《〈桐茎〉序》),故而深得郑珍、莫友芝赏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众人努力下,《遵义府志》终于付梓刻印。也是在这之后几年中,赵旭完成了辑录桐梓县籍前人诗歌的著作《桐梓诗略》(又名《桐梓耆旧诗略》)。可惜后来因战乱,《桐梓诗略》原刊刻本被毁,在其子赵彝凭努力收集下,才得以保存一部分,是为《桐梓耆旧诗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赴京参加会试,大病未死、侥幸得归的郑珍在遵义郡城见到了莫友芝、赵旭,内心有无尽的话要与好友诉说。三位文人再次相聚,除了闲谈叙旧,自然也少不了饮酒赋诗。席间,赵旭将新完成的《桐梓诗略》和《桐茎》出示,请两位好友删订、作序。郑珍作《赠赵晓峰》,赞叹赵旭之才与收集前人诗作之功(“九原若可作,耆旧应敢拜。晓峰新辑《桐梓诗略》《桐茎》二种”。莫友芝也作《次子尹韵赠晓峰》,回忆三人共修《遵义府志》事,赞叹《桐茎》和《诗略》之功(“示我《茎》与《略》,一一导厥脉。夜郎弹丸地,汉使早可喝。晓峰于《桐梓诗略》外复撰《桐茎》,补正新志遗误”。

看到好友新近完成的著作,郑珍想起了自己已完成却没有来得及审订、出版的《遵义诗钞》。《遵义诗钞》是辑录遵义府明清两朝前人所作诗歌的著作,郑珍在《〈播雅〉序》中自述,其“束发来”(十五岁以来),就从“郡中文献”留心辑录,“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义诗钞》”,惜无钱和没闲(“无资,且不暇”),已经压箱底很多年(“篋衍有年矣!”)。于是,郑珍进一步坚定了完成这部著作的决心,同时也加快了完成的脚步。清咸丰二年(1852年),郑珍将完成的《遵义诗钞》初稿,出示给自己的表叔、曾担任湖北布政使正赋闲贵阳的唐树义(字子方)。唐树义勉励郑珍完成这一著作,并答应资助出版。次年,郑珍“尽出前钞,重加去取”,命其儿子郑知同抄写定稿,更名《播雅》,请唐树义作序并付梓刻印。至此,收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252年间,220人2038首诗作的巨著《播雅》面世。

而莫友芝内心也早有辑录贵州明朝以来名家诗作的想法,但苦于一人之力、资料难以收集。对此,莫友芝在为郑珍《播雅》作的序中就向友芝云云欲取贵州自明以来名家能诗家之制为一帙……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以成此编也,可知矣!”因此,1853年,当赋闲贵阳待归草堂的唐树义决定“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将明代诗人诗歌部分交由莫友芝搜集辑录时,莫友芝欣然答应了下来。莫友芝在潘文炳(黔西人)及门人胡长新等协助之下,“旧录新采”(莫友芝《致唐子方书》),次年就完成了收录有216人30卷的初稿。后来经数次增补删订,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才最终定稿审定,而莫友芝却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溘然离世。最终,《黔诗纪略》在其儿子莫绳孙整理、唐树义之子唐炯资助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刻成书。

唐树义“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由莫友芝辑录完成明代部分,而清代部分则交给了郑珍的内兄黎兆勋。黎兆勋是黎恂的长子,常与郑珍、莫友芝交往,三人被清朝著名藏书家潘祖荫评为“西南三子”。可惜,黎兆勋辑录的稿子因战乱“稿尽亡失”,后来由其侄黎汝谦、莫友芝的弟弟莫庭芝、贵阳人陈田继续完成,并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付梓刻印,是为《黔诗纪略后编》。

《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都是辑录前人诗歌的总集,前两部是辑录一县一郡的诗歌选集,后两部则是分别辑录贵州文人由点及面、接续奋斗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四部著作体例相同、篇幅宏巨,都是“人系以传,传纬以事”(先为作者作传,再附录诗)。收录诗作方面,除了《桐梓诗略》是辑录一县的诗作、篇幅较少外,《播雅》收录了220人2038首诗,《黔诗纪略》收录了241人2406首诗,《黔诗纪略后编》收录了421人2000余首诗;并且作者的初衷相同,都是为了搜集保存一地之文献,背后蕴含的是郑珍、莫友芝、赵旭、黎兆勋等为代表的父辈与郑知同、莫绳孙、赵彝凭、黎汝谦等子侄辈为保存贵州文献、以供后人研究做的极大努力。

正如唐树义评价郑珍的《播雅》一样“白非子尹网罗摭拾,发扬光耀,则旷历年载,什九零落。后虽有心者穷加搜索,即姓氏且不能举,奚有于名章秀句之纷纶简册也哉!”若非前人穷搜极讨、采访整理贵州诗歌,为贵州文化守护与传承竭尽全力,后人能否看得到贵州历史上如此多的诗词、在文学上如此显著的成就就是很难想象的!

《遵义府志》的「副产品」
——从《桐梓诗略》《播雅》到《黔诗纪略》

张文建